

蕭立君  
台大外文系

### Waiting for a Native Theory?: Taiwan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ories

筆者近期之思考、寫作及研究的方向之一，與書美及幾位先進草擬的「知識/台灣」學群宣言所揭櫫的諸多理念和問題意識不謀而合；在這個短篇幅陳述的場合，與其詳述進行中的計畫，不如以回應宣言中拋出的若干議題做開端，帶出一些個人目前的想法與我想要處理的重點。如果這是一篇 *position paper*，我首先就可以清楚的表明我支持發展本土理論(*native theory*)的立場；但如何界定「本土理論」？何謂從台灣發展出來的本土理論？這些可能和「何謂理論？」是一樣棘手的大問題。從人文學界之全球知識生產的權力體系下來看(亦即就理論的 *political economy* 而言)，台灣顯然沒有理論；或者說，即使我們將台灣人文學界近二三十年來在理論研究上的成果看成是本土理論的具體呈現，這樣的理論發展與生產仍尚未在這樣的體系下被認可——當然，需不需要被歐美學界主導的權力關係所認可是另一個重要議題。不可諱言的，台灣學術論述常慣性的處於引用西方理論或方法來處理本土素材的附從地位，即使是非應用性的、在理論層次上思辯的論述，似乎仍多以某一或某些西方理論學說為依歸或參照之架構，進口理論的印記若非充斥其間，就是學術生產之正當性和知識權力不可或缺的象徵。

然而，我們也可從此說法的反面來看，甚至更推到極端來問：難道有任何西方理論的印記就代表不是本土理論了，就一定是被納入一種從屬關係了嗎？世界上各個文化、思想也鮮少有在真空狀態中發展，不曾與其他文化、思想元素交鋒或受其影響的，而台灣原本就是異文化、多語言交會之移民社會，且近年來愈趨肯定自身文化之多元要素、並樂於擁抱全球化。我認為台灣本土理論的發展與挑戰，並不能完全用像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ory* 這樣的外部權力關係來解釋，雖然後者很重要；這並不一定表示，譬如說，某一西方理論派別(或其混種的本土版本)在台灣蓬勃發展，是其內部、純理論層次的一些特質使然。我提議重思「何謂理論？」這樣的問題，並分疏「理論化」的兩個層面：第一是在認知層次(*the cognitive level*)上的理論化能力，我們的 *epistemic capacity to theorize* 是只能由我們自己去肯定的，尤其在目前的知識權力結構慣性地假設我們不可能是理論知識生產者的情況下；第二是致力於建立思想理論體系(或甚至非系統化思考路徑)的理論化，這方面台灣似乎還未看到旗幟鮮明的努力，或者說，這樣的理論化思考的成果尚未在這個我們都難以脫身的全球知識體系裡被認可。

就本土/西化理論這個面向，我初步的提法是將「理論」做為一種思考方式或甚至風格。這當然不是隨便、任一的思考方式。它常被認為是台灣既有文化傳統所欠缺，而以鼓吹、帶動改革的思潮或「進步理論」的姿態出現；或者是以一種類比的方式，將外來思想跟本土的思考風格或文化習性做連結，但思考方式的類

比或摹擬不見得就形成類似的思想內容。我的計畫之一就是以回顧長期以來西方思潮及理論在台灣之引介、翻譯、傳播、(再)生產為基礎，探討某種「進步傳統」(或曰‘改革的香火’)和類比思維(analogical logic)的角色或重要性，以及它們如何形塑了台灣本土理論知識的系譜。由此衍生出的議題之一，就是這一波波以改革為號召或職志的理論思潮帶來或留下甚麼，而此議題也促使我進一步大膽的(或不自量力的)思索台灣本土文化之 de/fault 的問題。

“Default”可以是內定值(借用數位科技術語)，是系統變動之後回歸的基準，而當今台灣文化特色之一，即是在不斷快速變化、多方文化角力、且集體未來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的情形下，我們似乎不再有、也不在乎有一個穩固、方便且不須辯詰的本土智識傳統(unproblematically ‘native’ intellectual tradition)可以回歸。台灣長期以來熱切擁抱、迅速吸納、轉譯外來文化的傾向其實是此特色之另一面，不應輕易地全盤以(neo-)colonial mimicry 來解釋；而我的假說是，從異己到「亦己」的過程，即使到了看似「接軌」的狀態，這樣形塑出的台灣文化仍不能擺脫其「斷層」的預設值(de/fault)。準此，個人認為任何本土理論的建構，須將上述台灣文化之 de/fault 的多面向納入考量：例如在一波波改革浪潮後沉潛澱積卻一直無法借以奠基的新文化因子；斷層的文化底蘊，也可啟發我們在吸納、效法西方理論時「錯開」契機與可能性。有意無意之錯讀，是為了走出另一條路，或者以較不目的論的說法，錯—在此我並非指任意、輕率的誤解或簡化—同時也可能是另覓蹊徑的契機，而非回到固有傳統或既定想法與價值體系裡尋求溫暖。